

论明代“陈庄体”及其诗坛地位

孙启华

【摘要】作家并称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出现自有其合逻辑性,亦有非合逻辑性。就有明一代而言,“陈庄体”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陈献章与庄昶因在文道观、诗学主张、诗歌创作特色等方面趋向一致而被时人并称,两人的诗歌相应地被称为“陈庄体”。然而,就实际而言,陈、庄二人在诗歌用字、诗歌风格、诗学渊源以及诗名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陈庄体”存在的合逻辑性与非合逻辑性,反映到其接受上便是呈现褒贬两极化倾向。对“陈庄体”合逻辑性的梳理和非合逻辑性的分析,旨在重新审视“陈庄体”在明代诗坛的地位,这对有明一代作家并称现象的深入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陈庄体;作家并称;文道观

【作者简介】孙启华(1984-),男,山东莱芜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师资博士后,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48~157

【基金项目】贵州省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陈献章诗文集校笺”(项目编号:17GZGX27)的阶段性成果。

一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向壁虚造,而是社会环境与现象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陈献章与庄昶并称及诗歌被称为“陈庄体”在两人在世时即已出现。这既是二人自我选择的结果,亦是当时诗坛、时人的认知。从这一层面来看,陈庄体自有其合逻辑性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对陈庄体的认识,明清两代评论者并没有固守成说,而是提出其存在的不合逻辑性。梳理明清两代有关“陈庄体”特点的论述及陈、庄二人诗歌差异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陈庄体”在明代诗坛的地位。

一、“陈庄体”出现的内在逻辑

陈献章、庄昶在世时,“陈庄体”这一称谓即已出现。与陈献章“以道相契”^[1]卷二,40叶^b的双槐先生黄瑜在《双槐岁钞》中记道:

昶善为诗,《咏包节妇》云:“二十夫君弃妾身,诸郎痴小舅姑贫。已甘薄命同衰叶,不扫蛾眉别嫁人。化石未成犹有泪,舞鸾虽在不惊尘。锁窗独对东风树,岁岁花开他自春。”罗一峰伦见之曰:“可以泣鬼神矣。”昶不以为然,惟乾坤鸾鱼、老眼脚头之

类,自谓为佳,如“枝闲鸟共天机语,江上梅担太极行”诸句是也,时称陈、庄体。^[2]^[3]^[4]

黄氏所言大略交代了陈庄体得来之由,并点明了“陈庄体”中庄昶的诗歌特色,即注重应用乾坤鸾鱼、老眼脚头之类词语。因是书内容“得诸朝野舆言,必证以陈编确论,采诸郡乘文集,必质以广座端人,如其新且异也,可疑者阙之,可厌者削之……”^[5]故黄氏所记大体还原了陈庄体得名之由。针对“陈庄体”这一称谓,庄昶在诗中亦有回应,其《题梅和韵》一诗云:

舞罢真香草阁风,瘦筇水月放天踪。有圈太极真成借,无画乾坤妙莫穷。此外可寻桃李圣,眼中谁认古今雄。凭君莫说陈庄句,已费天机浪语中。^[3]卷,36叶

据诗歌表述意思,“陈庄句”即针对包括黄瑜在内的时人评论而发。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陈庄体”的提出缘由及内在逻辑是什么?

陈庄体的产生,首要条件在于二人的并称。并称现象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其

“一般具有符号表征、连类聚合和数量限定三方面的特点”^{[4]77}。据黄瑜自序所言,《双槐岁钞》始于景泰七年(1456),终于弘治八年(1495),前后历时四十年。“陈庄体”载录于庄昶条目下,联系陈、庄二人交游,此四十年中,二人初相识于成化二年(1466),陈献章至京复游太学,因御史邢让之誉而名动京师,“一时缙绅云从景附”^{[5]白沙先生年谱},其中包括是年新登进士庄昶。此后二人又有两次会面:一为成化五年(1469),陈献章落第南归,便道金陵,看望在南京行人司任职的庄昶;一为成化十九年(1483),陈献章应聘至京师,过江浦,访庄昶并留宿月余。平日二人时有书信诗歌往来,并以知音自期,庄昶《答白沙》诗云:“南海春风一古琴,天涯回首几知音。”^{[3]卷二,45叶^b}不仅如此,陈献章屡遣弟子前往江浦问学庄昶。成化十二年(1476)至弘治三年(1490)间,陈献章弟子中先后有陈秉常、容彦昭、李德孚、林光、范规、李承箕、张诩、麦秀夫、湛若水问学于庄昶,如庄昶集中有《送白沙先生门人容彦昭陈秉常回南海》。然据庄昶《送陈直夫先生序》,他在京师时与十人最友善,如罗一峰、陈直夫、李滨之、娄克让等,更因与罗一峰、章懋、黄仲昭共同上书《谏元宵灯火疏》遭谪贬,被称为“翰林四谏”。那么缘何陈、庄二人并称并形成所谓“陈庄体”呢?考其实,这缘于二人有共同的诗歌风格、主张等因素。

由黄瑜记载及庄昶《题梅和韵》易知,“陈庄体”主要指的是类似庄昶“枝闲鸟共天机语,江上梅担太极行”等直接以“理语”入诗的诗歌。陈献章集中亦有此类诗句,如“但闻司马衣裳古,更见伊川帽桶高”^{[6]寄定山,434}。此诗为和庄昶《游茅山诗》之作,诗中有句云:“山教太极圈中阔,天放先生帽顶高。”^{[3]卷四,19叶^b-20叶^a}除以上所引诗歌外,陈、庄二人诗文集中此类诗作都占有一定比重。试观陈献章《林君求余一线之引示以六绝句》诗,面对弟子的荐举之求,陈献章无一言提及引荐之事,却从为学功夫上做了一番教导,全诗主要围绕此意展开,诗云:

时时心气要调停,心气功夫一体成。莫道求心不求气,须教心气两和平。

存心先要识端倪,未识端倪难强持。万象森罗都属我,何尝真体离斯须。

收敛一身调息坐,要贪真静入无为。脱然心境俱忘了,一片圆融大可知。

群贤列圣无他适,百伪千邪向此消。更向一源观体用,灵根着土发灵苗。

功夫须用宽而敬,鱼跃鸢飞在此间。不用苦心求太迫,转防日用自生难。

饱历冰霜十九冬,肝肠铁样对诸攻。群讥众诋寻常事,了取男儿一世中。^{[7]卷九,33叶}

再看庄昶,其诗特点在于善用邵雍《观物内外篇》之寓意,以物衬理,阐发己说。如《题沈石田画鹅为文元作》,诗云:“天机我不言,言之欲谁领。柳塘春水深,弄此白鹅影。”^{[3]卷二,2叶^b}

陈庄二人诗歌理学化之倾向,缘于二人的文道观。自明初至陈、庄生活的成化时期,文道观大体经历了由文道并重到重道轻文这一过程。就代表人物而言,文道并重者为最高统治者及在朝为官者,而重道轻文者主要是理学家。迨至成化、弘治时期,理学家对文道关系亦逐渐发生分歧。明代前中期理学家以承续宋代道学之脉自居,深信自己是宋儒的继承者。无论是薛瑄、吴与弼,还是胡居仁,在描述儒学兴废时,都是以承续宋儒自任。如胡居仁在《复于先生》中说:“又念道自宋儒去后,不胜寥落。自元及今,儒以训诂务博为业,以注书为能传道。使世之学者,浅陋昏昧,无穷理力行之实。此有志者,不能不以为忧也。”^{[8]卷一,13叶^b}明代前中期的理学家,虽以程朱后学自居,但在文道观上,对朱熹的观点有所保留,片面强调作文害道的一面。以章懋为例,他认为:“词章之学,治世用之不能兴礼乐,乱世用之不能致太平。”^{[9]卷一,7叶^a}于是在“三不朽”位次上,将文章置于末位:“上者以道学相传,其次则以孝行、忠义、勋业、政事、清节著称,又其次则为文章大家。”^{[10]卷三,94}不同于章懋、胡居仁等人,陈献章、庄昶在文道观上持文道并重的观点。

实际上,陈献章对“文道”关系的态度,经历了由“重道轻文”到“文道并重”的转变过程。陈献章曾回

忆说“予自成化辛卯秋九月以来，绝不作诗，值兴动辄遏之”^{[6]《杂诗序》²¹}

，但随着其“自得”说的成熟，早年的“遏诗”之举不复存在，如“静坐观群妙，聊行觅小诗”^{[6]《四月》³³⁹}

，“江门诗景年年是，每到春来诗便多”^{[6]《饮酒》⁴⁷¹}

，“神仙自古非无术，佳节如今更要诗”^{[6]《壬辰秋九日圭峰作》⁵⁰²}

，等等。陈献章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在自得观的思想下，他逐渐认识到诗歌作用大小全在于自我如何应用，即“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6]《夕惕斋诗集后序》¹¹}

。此处他所说的诗歌作用之大者，在于宣扬理学“道”的传统。这决定了其诗歌特色的与众不同，诚如其弟子湛若水在《浴日亭次东坡韵》诗后跋所言：“此吾师石翁先生手书《浴日亭和东坡》之作也，识者以为度越前作矣。夫以先生片言只字皆发于妙道精义之蕴可以为训，又非特诗人墨客之比已也。”^{[11]卷二，14b}此主张在庄昶那儿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吕怀在《定山庄先生祠田记》中说：“唯是退居定山，日事倡明斯道，尤锐志以诗文立言。是故其为言也，不曰太极则曰鸢鱼，不曰乾坤则曰经纶，不曰位育，挥霍古今，吞吐宇宙，横骋乎羲轩尧舜之上，追纵乎风花雪月之豪。”^{[3]附录}汪循亦云：“欲知先生之心者，当观先生之诗；善观先生之诗者，亦可见先生之学。”^{[3]附录}庄昶认为“诗，吾性情；文，吾威仪”，对当时儒林所持“文是道之累”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古今完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节讲易，伊川谓其好听，而朱子又有与圣门不同之说，盖康节得易之数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谓子美夔州已后之诗自出规模，横逆已甚；李、杜、陈、黄得诗之辞而诗之理不得也；先儒又谓六经已后无文，盖班、马、韩、苏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也，惟周程张朱之学可以无间然。孔子自以为不试故艺而子贡又谓孔子天纵将圣又多能也。是则康节之数，子美之诗，太史公之文又岂足为吾道君子之累哉？^{[3]卷六《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5叶}

庄昶认为邵雍以及李白、杜甫、陈师道、黄庭坚等人虽然在易、诗、文等方面有不足，但他们都是继承先贤而来，白璧微瑕。基于此种认识，庄昶将文分成不

同的类别，有诗人、文人之文，有圣人之文。在《滁州志序》中，庄昶以“天下之物固有遇不遇者，盖亦数也”作喻，指出滁州不足为遇。不管是为官于此的韦应物、王元之、欧阳修，还是做客于此的苏东坡、曾巩、满执中，都是文人、诗人，他们不足以使滁州闻名，因为“骚雅余谈，文章小技者，恶足以当此哉”^{[3]卷六，1叶^b-2叶^a}！他还以“月亮”为例，指出有诗人之月、文人之月、诗颠酒狂之月、自得性天之月。在他看来，前三者之“月”无足取，唯有自得性天之月，即圣贤之月才值得追求和提倡：

夫诗文人之月，无所真得，无所真见，口耳之月也。诗颠酒狂之月，醉生梦死之月也。惟周茂叔之月，寂乎其月之体，感乎其月之用，得夫性天之妙而见夫性天之真，自有不知其我之为月而月之为我也，所谓曾点之浴沂，孔子之老安少怀，二程子之吟风弄月、傍柳随花，朱紫阳之千葩万蕊争红紫者是已。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也，所谓圣贤之月也。^{[3]卷七《月轩序》，25叶^b-26叶^a}

由上可知，庄昶坚持的文道一体之说，不是指所有的文，而是指圣贤之文，非文人、诗人之文。理解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庄昶会说出“莫怪不知杨万里，草庐文字子思心”^{[3]卷一，15叶^a}这样的话。

陈、庄二人特别是陈献章在“自得观”的主张下，调和文道关系，坚持文道合一，使诗歌回到诗教传统。至此，我们再反观陈、庄二人及“陈庄体”，实是二人交游、诗文理论及诗歌创作倾向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主观上来讲，庄昶与“十友”中的陈献章最终并称并形成“陈庄体”是二人自选的结果。陈献章弟子湛若水在庄昶墓碑铭中曾引时人之评：“先生与白沙之诗可谓世称两绝者。”^{[3]《明定山先生墓碑铭》，叶^{4a}}此外，“陈庄体”的说法亦是时人对二人选择、认定的结果，这可从当时诗坛的崇尚流变一窥其中缘由。自明初至弘治中叶，诗坛以崇尚理学、宗宋为主流，茶陵而后，诗坛以唐诗为宗。陈、庄二人，在崇尚唐诗的品评者看来，自然被视为异类，属于诗坛旁门。正如杨慎在《胡唐论诗》中所说：“永乐之末至成化之初，则微乎渺矣。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

艺苑则李怀麓、张沧州为赤帜,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则陈白沙、庄定山称白眉,而识者皆以为旁门。”^[12]卷五四、^[63]陈、庄二人结识、交游、唱和,在诗文创作及文道观上达成相似性或一致性,而在二人的互契及时人、后人的认知与选择之下最终使二人诗歌具有了鲜明的符号特征,形成“陈庄体”这一称谓。

二、陈庄并称的不合逻辑性

“陈庄体”的形成是陈、庄二人相契认同基础上逐渐获得时人承认的结果,有其历史性与合理性。但是,一种诗体的固定预示着后人对相关诗人诗作的固化,最终导致诗人诗歌内容和风格的类型化。明清两代有关二人风格的论述及其背后的论争也暗示了对“陈庄体”这一称谓合逻辑性的质疑。

陈、庄二人诗歌高下之别的争论发轫于二人诗歌特点尤其是庄昶诗歌用字特点的评论。成化二年(1466),陈献章复游太学,与庄昶订交并在诗学宗趣等方面开始趋于一致。二人对彼此诗歌特点互有点评,在给弟子讲授诗法时,陈献章常以庄昶诗歌为范,如批复弟子张诩诗歌时说:“概观所论,多只从意上求,语句、声调、体格尚欠工夫在。若论诗家,一齐要到。庄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极费工夫。”^[6]《批答张廷实诗笺》。^[75]送别童子方祥庆时称赞庄昶之诗,说自己“千炼不如庄定山”^[6]《夜坐与童子方祥庆话别偶成》。^[546]陈献章诗歌的特色,庄昶概括为“自然”,其《读白沙先生诗集》云:

飞云一卷递中来,上有封题是石斋。喜把炷香焚展读,了无一字出安排。为经为训真谁识,非谢非陶亦浪猜。何处想公堪此句,绝无烟火住蓬莱。

天然无句是推敲,诗到江门品绝高。几处风花真有此,古来周邵本人豪。冥心水月谁堪会,盥手山泉我自抄。读到鸟啼春在处,江山垂老觉神交。

海上千峰阁病舆,傍花随柳意何如?老谁静里都无事,笑此山中亦著书。帝伯皇王铺叙里,乾坤今古笑谈余。我看此意终谁领,略与人间一破除。

才力凡今我与翁,百年端许自知公。横渠老笔虽终劲,周子通书自不同。南海巨觥都水月,

卧林狂句也溪风。酒杯许更何时约,烂醉罗浮四百峰。^[3]卷四,25叶b-26叶a

二人相互推重如此,其实质则是庄昶“才力凡今我与翁”的自信,也是对当时诗坛舍我其谁的宣言。庄昶推许陈献章诗自然,而陈献章自愧己诗锻炼不如庄昶。以此为始,明清两代对二人诗歌特点有以下概括。

陈献章诗歌的特点为重声韵、浅易自然、不忌重字。李东阳注意到陈献章诗歌的声韵美,“陈白沙诗,极有声韵。《厓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割据亦成功。身为左袒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岳王宫。’和者皆不及。余诗亦有风致,但所刻净稿者,未之择耳”^[13]第二卷,545-546,此观点,周子文《艺薮谈宗》亦有相近表述。黄佐、王世贞、邓伯羔注意到陈献章诗歌的浅易自然,如黄佐云:“先生有言:‘子美诗之圣,尧夫又别传。’盖赏其自然也。意则欲兼二妙而有之,岂非以自然为宗者。……先生之诗,言近指远,因斯训释,当妙悟入神矣。”^[14]卷三九《白沙律诗解注序》,14叶b-15叶a王世贞通过比较陈白沙与王守仁之诗,指出:“公甫微近自然,伯安时有警策。”^[15]《艺苑卮言》卷六,1954骆问礼在《徐生二诗》中指出陈献章诗歌有不忌重字的特点,其云:“两诗皆有重字,近世文征明《甫田集》多如此,若陈白沙集专以此诧人,谓:‘不忌重字,乃为豪迈,恐唐人制律之意不若此耳。’”^[16]卷八,16叶a

相比之下,庄昶诗歌的用字尤其是陈献章所提出的注重锻炼这一特点,在明清先后引发了三次争论。

第一次为安磐针对李东阳所举庄昶诗从源头上予以反驳。庄昶诗歌注重锻炼的特点,李东阳在《赠彭民望三首》其一中说:“庄子作诗苦,饥肠无停回。胸中锦绣字,字字不轻裁。”^[13]第一卷,130在诗话中,李东阳又列举数例作证,庄定山“苦思精炼,累日不成一章。如‘江稳得秋天’、‘露冕春停江上树’,往往为人传诵。晚年益豪纵,出入规格。如‘开辟以来元有此,蓬莱之外更无山’之类”^[13]第二卷,546。对此,安磐

指出“天地以来元有此，蓬莱之外更无山”为庄昶抄袭他人之句：“李西涯录为佳句。国初王当宗诗：‘三代以来方有学，六经之外更无书。’定山毋乃太相袭欤！”^[15]安磐《顾山诗话》，812

第二次为邓伯羔对陈献章之说提出反例。邓氏在《艺彀》中批评说：“定山每以自然推白沙，而白沙却以锻炼推定山。其诗曰：‘一诗可送方童子，千炼不如庄定山。’是也。定山之诗曰：‘赠我一杯陶靖节，答君两首邵尧夫。’是千炼而就乎？抑不炼而就乎？侏儒问天于修人，修人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之于我。’两公相较，庄稍稍习白沙意，定山犹近之也。”^[17]卷中，7叶b-8叶a

第三次为黄宗羲对钱谦益之说表示反对。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说：“孟暘刻意为诗，酷拟唐人，白沙推之，有‘百炼不如庄定山’之句。多用道学语入诗，如所谓‘太极圈儿，先生帽子’、‘一壶陶靖节，两首邵尧夫’者，流传艺苑，用为口实。……余录孟暘诗，痛加绳削，存其不倍于雅道者，于白沙亦然。”^[18]丙集第四，2917-2918针对钱谦益认为庄昶“多用道学语入诗”，黄宗羲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钱谦益不了解庄昶所致。黄宗羲在庄昶小传中说：“先生形容道理，多见之诗，白沙所谓‘百炼不如庄定山’是也。唐之白乐天喜谈禅，其见之诗者，以禅言禅，无不可厌。先生之谈道，多在风云月露，傍花随柳之间，而意象跃如，加于乐天一等。钱牧斋反谓其多用道语入诗，是不知定山，其自谓知白沙，亦未必也。”^[19]卷四五《诸儒学案上三》，1079

三次论争主要针对庄昶诗歌是否有注重锻炼的特点，第一次论争，安磐针对的主要是庄昶模仿前人语句问题；后两次，论争双方实际上都是从庄昶诗歌的优劣面各自自圆其说。但争论的背后隐含的是陈庄二人诗歌高下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明清两代评者大致认为陈献章诗更胜一筹。明人沈德符在《诗厄》中言：“怪率之诗，起于玉川，而极于打油钉铰，然而至今传也。我朝道学诸公，习为鄙亵之调，欲以敌词人，徒增其丑耳。如庄定山云：‘枝头鸟点天机语，担上梅挑太极行’及‘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

之类，真堪呕哕，而沾沾自以为佳句。试阅陈白沙及王阳明、唐荆川初年作，何等清新整栗，有此一字否？”^[20]卷二六《诗厄》，678清人宗柟在陈献章草书卷子后下识语说：“按《静志居诗话》：成化间白沙诗与定山齐称，号陈庄体。然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其言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故所作未堕恶道，非定山比也。其云‘百炼不如庄定山’盖谦辞尔。”^[21]⁶⁶⁶金武祥亦持此观点，认为陈献章的论诗观点显示出陈诗比庄诗高明。

即便抛开陈、庄二人诗歌孰高孰下这一问题，二人在诗歌风格上因性格原因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陈献章的性格，庄昶概括为“大”，在《友山诗序》中，庄昶对在京中所交十友的性格曾作如下描述：“陈白沙之大，罗一峰之廓，陈直夫之直，李宾之之敏，娄可让之公，潘应昌之伟，章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温，黄仲昭之畅，林缉熙之雅。”^[3]卷六《友山诗序》，17叶b王世贞概括陈献章性格为“潇洒”，“献章襟度潇洒，神情充预，发为诗歌，毋论工拙，颇自风云”^[15]《明诗评三》，2024。庄昶性格的突出特点是雄豪，霍韬云：“先生豪杰也。”^[3]附录《祭叔庄先生文》闻人诠亦说：“定山先生真所谓当时之豪杰也。”^[3]附录《读定山先生集》从庄昶早年上谏元宵灯火疏来看，其性格确有雄豪一面。其雄豪的性格，亦时时在诗文中呈现，突出的特点便是“豪放不拘规格”，“发泄成章字字新”，“先生之学、之诗、之文，高古渊粹，机轴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篱下作活计”。^[3]附录《书定山先生集后》陈献章称赞庄昶注重锻炼也是出于此种考虑。庄昶集中多有豪放、不肯寄人篱下之诗，如《木石图为许志完作》：

定山破袖无尺大，东归袖取蓬莱峰。峰头老秃几千树，槎牙万古撑长空。箕山老人不晓事，问余欲向青天住。醉中见许不作难，袖中滚滚倾天地。老人睹此造化权，返却而走心茫然。忽然江海一平地，千仞万仞飞苍烟。锦树苍峰不须买，草阁秋崖明月在。白头得此当有知，还我东坡袖中海。^[3]卷一，5叶全诗想象奇特，虽是题画之作，却出入于画面之外。首二句用夸张之语营造一种雄阔之势，三、四句由整体转向局部，描绘出峰头秃树万笏朝天之势。中间

六句通过箕山老人前后气色的转变再次凸显蓬莱峰的雄壮气势。接下来两句用“忽然”一词将观者的视线由峰顶引至海边平地。整幅画面，有万仞之高的险峰，有平如江海般的平地。一高一低，一险一缓，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后四句由画阐发自我感悟，青峰、明月何须购买，本属万物。最后两句化用苏轼“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之句，与首句呼应。

此外，二人在诗学渊源上亦稍有差异。性格追求洒脱的陈献章更倾向于学习陶渊明的洒脱，庄昶则更倾向于学习杜甫、黄庭坚的顿挫。陈献章注意到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志士气节，“美恶杂居，贤者羞与不肖伍，万一有如陶元亮辈人，傲睨期间，其肯为五斗米折腰而不去耶”^{[6]《与顺德吴明府》，208}，又云：“未肯低头陶靖节，挂怀身外五男儿。”^{[6]《读林和靖诗集序》，454}陶渊明挂冠而归，陈献章上疏辞职归乡，二人在性情上有着较多的相似。古人讲究“文如其人”，陈献章坦言自己倾慕陶诗，“五言夙昔慕陶韦，句外留心晚尚痴”^{[6]《读韦苏州诗》，671}。在初学作诗时，陈献章模仿对象之一便是陶渊明。其集中有和陶诗十二首，唐伯元曾作如是评价：“音响浑似陶而格调更恢廓。”^{[5]卷一，5叶b}陶诗、陈诗之格调，我们于此不作高低之判，但从中可知陈献章对陶渊明的态度。由赞美其人格，到模仿、唱和其诗歌，并体味其诗歌中所独有的平淡、洒脱，所有这一切，无不与陈献章自己的主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献章作诗主张自然，反对雕琢，而陶诗的似澹实腴，不拖泥的特点，恰合陈献章自己的品位。“或疑子美圣，未若陶潜淡”^{[6]《示李孔修尽诗》，303}，“魏晋以前无近体，独怜陶谢不拖泥”^{[6]《晚韵示藏用诸友》，449}。基于此种认识，陈献章不自觉地树立起陶渊明在心目中的典范作用，相应地对类似陶诗特点的诗人予以青眼相待，如林和靖、韦应物、谢朓。陈献章《读韦苏州诗》其一云：“夜雨斋灯卷未收，清谣百首对苏州。晦翁两眼沧浪碧，也为先生一点点头。”^{[6]671}夜雨斋灯，诗读百首而不倦。陈献章虽未直说一句赞语，然灯下举动早已表其态度。用朱子青眼相加为之点头事，已表达了陈献章对韦诗的态度。

庄昶少时学诗即读黄庭坚之诗，据其门婿王弘记载，庄昶十七岁时读黄庭坚诗至“俗学已知回首晚”之句，慨叹几误年华，从此致力于性命之学。庄昶对黄诗印象颇深，认为他接续三百篇之旨。在《送潘应昌提学山东序》中，庄昶依次列举正学的各个余脉，他说：“河出龙马，洛出龟书，天地之秘泄矣，而伏羲神禹之后惟邵康节得之；光风霁月，鱼跃鸢飞，道之妙形矣，而仲尼、颜子之后惟濂溪、二程、朱晦庵得之；国风、雅、颂删自仲尼，人之善恶著矣，而三百篇之后惟杜甫、李白、陈后山、黄山谷得之；云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著矣，而典、谟、训、诰之后惟班固、马迁、韩愈、苏轼得之。”^{[3]卷六，4叶b}庄昶虽认为杜甫、李白、陈师道、黄庭坚接续三百篇，但这并非意味着奉他们为圭臬。在庄昶看来，他们只是“得诗之辞而诗之理不得也”。同样，在散文方面，庄昶认为班固、司马迁、韩愈、苏轼志得文法而“文之理不得也”^{[3]卷六，5叶a}。庄昶旨在要学其辞并融入理，故其“发于诗文，出入杜韩，脱换苏、陈，终则一濯其秽，大音希声，溢为雅风”^{[3]补遗，34叶a}。

除以上所论几点外，陈、庄二人名气、文集的流传多寡亦成鲜明对比，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诗名与科名方面，庄昶出名远早于陈献章。二人相交是庄昶进士及第之后，早在未进士及第时，庄昶已有诗名。李东阳云：“庄定山孔賜未第时，已有诗名。苦思精炼，累日不成一章。”^{[13]第二卷，546}陈献章对庄昶之名早有耳闻且怀仰慕之心，在给友人王乐用的信中说：“比岁闻南京有庄孔賜者，能自树立，于辞不一雷同今人语，心窃喜之。稍就而问焉，果出奇无穷。”^{[6]《与王乐用金宪》，154}陈献章有时竟以得到庄氏的只言片语为幸事：“江门之水常渊，月光云影江吞天，安得古今名家如刘文靖、庄定山题一言？”^{[6]《枕上》，325}成化五年二人订交，林俊曾言：“友一峰而节概明，友定山而诗学更大进。”^{[22]《祭白沙陈先生》，卷二六，8叶}庄昶因上元宵谏灯疏而被迁行人司副，后乞归。后来虽被荐为南京吏部，但最终托病不出。早年虽以气节著称，但“沦落者垂三十年”，加之浸于讲学却鲜有嫡传弟子致其名气不广。陈献章则不然，虽几次春闱不售最终隐居不仕，

但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其逐渐通过地方大吏荐举及弟子宣传而声名大振。陈献章在家乡讲学授徒,弟子张翊在《嘉会楼记》中曾记叙当时往来白沙问学的情景:“白沙先生倡道东南,几四十年矣,天下之士闻风从,而凡东西往来与夫部使者过必谒焉,村落茅茨土栋,至无所容。”^{[23]卷五,3叶a}

陈氏弟子中以湛若水宣传其师最为着力,所谓“传世倚增城”^{[24]卷二《白沙祠四十韵》,35叶b-36叶a}。湛氏一生以兴办书院为己任,每办一书院,即于书院旁建白沙祠。不唯如此,湛若水还致力于陈献章文集的刊刻及诗歌学说的阐发。这可从他编选的《白沙先生诗教解》一窥。此书采用传统古书体例,以首章名其篇,如“有学诸篇”第一。诗教解十篇十卷、诗教外传五篇五卷,共计十五卷。从正文前小序,到篇章的命名,都具有传统“经”的体例。在解题中,湛氏进一步阐述了是书所作之由:“夫白沙诗教何为者也?言乎其以诗为教者也。何言乎教也,教也者,著作之谓也。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天下后世得之,因是以传,是为教。”^{[25]卷一,1叶}从二人文集版刻情况看,陈庄二人亦存在不平衡性。陈献章文集明清两代刊刻的系统大概有五个版本系统,前后刊刻十三次之多。除此而外还有各种选本如《白沙先生诗近稿》《白沙先生文编》《白沙先生诗教解》《大儒学粹》《新刻国朝白沙陈先生诗选》等。庄昶文集明清两代先后刊刻仅六次^①。

此外,明清两代,追和、步韵及仿效陈氏诗歌者亦不乏人。陈献章弟子自不必说,其他有罗洪先、董沝、庞嵩、林大春、张天赋、林大章、胡方、何梦瑶、王夫之等人。以胡方为例,“粤人皆以金竹(胡方籍贯)比白沙”^{[26]陈澧《鸿臚堂诗序》},胡方诗文集中多赞美陈献章之作,如《白沙先生茅笔草书歌》《梦游圣池歌》《汪日岸邵园看梅并观陈白沙夫子梅花诗卷》《路经白沙》《读白沙子梦道士囊贮罗浮遗之诗》《谒白沙夫子祠》《读白沙夫子诗》《白沙子自制玉台巾》《白沙子论》等。胡氏还常借用白沙诗句或诗意图入诗。《梅花四体诗》之“看花终日事,未把看花看。直待今朝悟,无心弄

影难”^{[26]附录,13叶b}。“无心弄影难”一句即借用陈献章五律《梅花》诗。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对陈献章多有肯定^②,其诗文集中有《柳岸吟》一卷收诗八十七首,其中有二十六首为和白沙之作,另有四首提及白沙。此卷开篇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为呼应陈献章之作。三部分相加,共计三十一首,占总数三分之一强,可见王夫之对陈献章的重视。此还可以卷中《见狂生诋康斋白沙者漫题》一诗为证,诗云:“任尔舌尖学语,谁知跌下生根。一线经分子午,双钩画破乾坤。逼窄墨台狭路,萧条原宪柴门。天下古今几许,梨花春雨黄昏。”^{[27]300}此诗首联肯定了吴与弼、陈献章不可动摇的理学地位。颔联赞赏陈献章贡献,正如黄宗羲所说的有明之学,白沙开其端。颈联赞赏他们的安贫乐道贤人风尚。尾联再次申明吴与弼、陈献章古今之地位。

陈庄二人虽因诗学观及创作相似而得以并称,然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二人之间实存在诸多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暗示着“陈庄体”这一称谓具有不合逻辑性,其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对庄昶诗歌注重锻炼这一特点的论争;另一方面则向我们展示了陈、庄二人诗歌创作上的不同倾向,这无疑扩展了“陈庄体”的内在歧向。

三、“陈庄体”的接受争议及诗坛地位再评价

“陈庄体”之形成是一回事,被接受又是一回事,后人未必以成说为圭臬。褒与贬并存成为“陈庄体”接受中的一个突出现象。

杨慎《胡唐论诗》概述永乐至弘治期间诗坛流变,其中“陈庄体”虽被称为山林诗的代表,但也表明时人颇视其为“旁门”,作为“赤帜”的对立面而存在。复古派领袖李梦阳针对“陈庄体”诗歌言理、用理语的倾向提出批评:“今人作性气诗,辄自贤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等句,此何异于痴人前说梦也?即以理言,则所谓‘深深’、‘款款’者何物耶?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又何说也?’”^{[28]卷五二《缶音序》}

对“陈庄体”,批评者有之,褒之者亦不乏人,以清人王钺为例,他在《晚寤斋诗集叙》中云:“有明一代,诗人辈出。有所谓四才子者,有所谓七才子者,

又有所谓后七才子者，其既也一举而矫之以袁、徐，再举而矫之以钟、谭。而陈白沙、庄定山两公独以其道学一派，远追新安，卓然有发乎情，止乎义理之风，盖所谓亘万古而不忘心会而得之者，岂不存乎其人哉！余持此道以论诗久矣，盖落落乎于世，未有合也。”^{[29]卷一，28b-29a}王餗认为陈、庄二人以“发乎情止乎义理之风”而戛戛独造，屹立于当时诗坛。

不难看出，“陈庄体”因接受者不同的诗学宗趣而呈现出褒贬判然的现象，后人对“陈庄体”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针对陈、庄二人诗歌说理、用理语入诗。这并非是说诗歌不要含理，而是贵在有理趣，正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所言：“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30]凡例}其实，陈、庄二人诗歌自有其各自面目，亦非专作理语。这样看来，时人或后人之批评有其局限性，相应地评价和诗坛地位也有失偏颇。因此，“陈庄体”在有明一代诗坛应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就明代前中期诗坛演变而言，永乐以降，诗坛盛行台阁体，诗歌内容多以鸣盛世感圣恩为主，风格上雍容典雅。此种风格虽与时代的繁荣昌盛有着莫大关系，然而此种风气长久充斥文坛，势必造成一种沉闷之气，特别是倡导台阁者多为台阁重臣，易形成广泛影响，“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31]卷一九〇，520b}。李东阳就认为“台阁诗或失之俗”^{[32]卷二，549}。不唯如此，因台阁体的主要成员为达官贵人，故为文有时出于交游之目的，多为文而造情。陈献章在《澹斋先生挽诗序》中曾言及在京师从贵公卿游诗的一番经历，他说：“余顷居京师二年，间从贵公卿游，入其室，见新故卷册满案，其端皆书谒者之辞。就而阅之，凡以其亲故求挽诗者，十恒八、九，而莫不与也。一或拒之，则艴然矣。惧而艴然而且为怨也而强与之，岂情也哉！噫，习俗之移人，一至于此，亦可叹也。天下之伪，其自兹可忧矣。”^{[33]90}相较于台阁重臣，陈献章、庄昶虽是释褐之人，然两人长期端居林下，故而少受此种风气影响，况且二人重在心学，讲求自得，反对模拟，从而表现出不一样的诗文风格。庄昶说：“人贵乎自得，不贵乎摹拟；贵乎真

见，不贵乎仿佛。优孟之学孙叔敖，人徒见其祇掌谈笑无不相似，以为真叔敖矣，殊不知去冠解衣，谢其摹仿，而故吾犹自凜然，而所谓真叔敖者，终不可以为固无恙也。”^{[34]卷一〇《醉月跋》，12叶^a}正是因为坚持自得，陈、庄二人对当时的宗唐宗宋之风提出了批评，陈献章说：“近代之诗，远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后生溺于见闻，不可告语。”^{[35]《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66}陈、庄二人虽渊源邵雍击壤诗，有着宋诗主理的特征，但陈献章又主张性情、风韵，这与唐诗颇相近，杨慎亦称赞庄昶的诗“有可并入唐人者”^{[36]卷五五《庄定山诗》，658}。因为坚持诗文得之心而发乎外，陈献章畅言自己的诗是“还属姓陈人”；庄昶之诗，“非魏晋诗，非唐，非宋、非元诸名家诗，定山之诗也”^{[37]卷一七《定山先生诗集序》，9叶^b}。在台阁体大盛天下之时，陈、庄二人之诗因独特个性傲然耸立于诗坛。安磐即言：“若论其兴致之高，自成一家，可以震响流俗，亦一时之英，不可诬也。”^{[38]《顾山诗话》，816}

其次，“陈庄体”在明代诗坛上的特殊意义还可通过明代“击壤派”诗歌的接受上加以探讨。有明一代，士人对邵雍之接受，大多承续宋、元以来的观点，褒大于贬，既称其学术，又赞其人格。陈庄二人对邵雍诗歌的推崇与邵雍人格魅力有莫大关联，庄昶《与李敬熙》即云：“蛮貊虎狼尼父叹，中华男子邵雍痴。”^{[39]卷五，1叶^b}对邵雍学术、人格的赞美，陈献章亦多有论述，“吾闻邵康节，撤席废眠卧”^{[40]《景易读书潮连赋此曷之》，313}，“还须邵康节，来驾白牛车”^{[41]《梅花》，370}。在《与湛民泽》中，陈献章借邵雍之诗表达其出处观，说：“假令见几而作，当不俟终日遑恤，其它特患不得其时耳。康节诗云：‘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42]90}陈献章还以邵雍为例，学其归隐。在《答石阡太守祁致和》中对邵雍的悠闲充满向往，诗云：“六年饱读石阡书，习气于今想破除。雪月风花还属我，不曾闲过邵尧夫。”^{[43]636}正是鉴于对邵雍归隐、悠闲、风雅等的向往，陈献章在诗中感慨：“只学尧夫也不孤。”^{[44]《次韵廷实示学者》，495}

除了对邵雍人格的赞美外，陈献章还注意到邵雍诗歌的特色：温厚和乐。在批答门人张廷实诗时，

陈献章说：“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¹⁶《批答张廷实诗笺》，⁷⁴更重要的是，陈献章对邵雍“删后无诗”说的继承，“敢为尧夫添注脚，自从删后更无诗”¹⁶《读韦苏州诗》，⁶⁷¹。“删后无诗”源于邵雍《击壤集》序所言：“是以仲尼删《诗》，十去其九。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¹³³¹邵雍“删后无诗”之说，目的在于说明《诗》的作用在于垂训。陈献章说自己愿意作邵雍诗的注脚，其用意无非是表明自己要继承邵雍的主张，上续《诗经》的诗教传统。正是基于对邵雍人格及诗歌特色的认同，陈献章对邵雍诗歌多有次韵、追和及模仿之作。如《夜坐因诵康节诗偶成》《追次康节先生小圃逢春之作》《和康节闲适吟寄默斋五首》《真乐吟效康节体》《雨中偶述效康节》。其中《和康节闲适吟寄默斋五首》为追和邵雍《闲适吟》之作，是陈献章对闲适生活向往与追求的表现。在邵雍看来，黄粱梦醒，会让人倍觉凄凉，“等是一场春梦过，自余恶足更悲凉”。陈献章亦云：“古之为士者，急乎实之不至；今之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¹⁶《与林蒙庵》，²⁴²陈献章对邵雍诗歌推崇如此，故两人诗作多有相似之处，以致后人整理陈献章集时误收邵雍诗作。天启元年(1621)刻本《白沙先生全集》中就误收邵雍诗作，如《无题》诗三首为邵雍的《凭高吟》《偶得吟》《利名吟》三诗；《元夕》诗为邵雍《感雪吟》。

陈献章诗与邵雍诗之关系，孙原湘《跋击壤集》云：“康节先生《击壤集》寓易理于韵语，所谓俯拾即是与道大适者。其风韵胜绝处，后来惟陈白沙得其元微，此事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³⁴卷四三，¹³叶^b唐顺之《与王遵岩参政》认为“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而“知康节诗者莫如白沙翁”³⁵³⁰⁰。俞宪《盛明百家诗·陈白沙》卷首亦云：“白沙诗从《击壤集》中来，当另作一家看。”³⁶⁶⁴⁷然而，诗歌创作可以模拟始，且不可拘泥于此，所谓拟议以成变化，才能彰显出一种诗歌风格的生命力，“凡学之者，害之者也；变之者，功之者也”³⁷《阮集之诗序》，⁴⁶²。陈献章与邵雍诗歌的不

同，尤侗在《艮斋杂说》中说：“陈白沙道学诗人也。而其论诗曰：‘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岂非诗家三昧乎。其诗天真烂漫，脱落清酒，有舞雩陋巷之风，不止追踪击壤也。”³⁸卷三，⁵⁵尤氏所云认识到二人的相异，眼光颇为独到。

邵雍理论基础是“以物观物”说。“所谓‘以物观物’是对‘以我观物’而言的，即排除个人的感情，而去体察万物，从而达到所谓‘穷理’‘尽性’‘知命’。”³⁹⁴⁴陈献章主张自得，注重个体的参与，故其诗歌中包含着更多自我情感的投入。由此而言，庄昶诗歌更多倾向于继承邵雍的观物说。其《雪蓬为盛行之作》末句：“只有区区观物亭，半庭茂叔窗前草”³¹卷一，⁴⁶即可视为对邵雍学说的回应，也是他作诗的一贯主张。这一主张也贯穿于他的题画之作，如《题通伯先生山水画》《钟钦理画牛》《题沈石田画鹅为文元作》《题菜》等。正是陈庄二人的提倡，才使得有明一代，学击壤派者“转相模仿”³¹卷一五三，³⁹⁶⁶。

再次，陈、庄二人试图将政统、道统、文统三者集于一体，表现在文道观上，往往将文视为表达天道、世道、人道的一种载体。相应地，他们不太注意区分论道之文、论政之文及写景抒情之文，往往将自己对道的体认、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自己的人生体验融汇在一起，使自己的诗作中常含有诸如“乾坤鸢鱼”“老眼脚头”之类的理语，确实有碍于诗歌趣味的体现。然而诚如纪昀在《治亭诗介序》中指出：“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相互激，相互救也。”⁴⁰¹⁶³陈庄体之流弊刺激着后继者加以改进，重新思考诗歌的格调、文道、情理等方面的关系。黄佐在《文体三变》中说：“弘治，检讨陈献章、庄昶，养高山林以诗鸣，谓之陈庄体，为世所宗。李东阳极力变之。”⁴¹卷一九李东阳如此，前七子部分主张也是针对陈、庄二人所代表的“陈庄体”而提出的补救措施。“生变”与“补救”恰恰持续了“陈庄体”在诗歌发展中的影响。

总之，陈献章、庄昶二人因交游、文道观、诗歌写作倾向的相似而得以并称，但亦由于诗学渊源、性格的相异而在诗歌用词、风格及诗学等方面表现出各

自独特面貌。换句话说，“陈庄体”的产生既有其合逻辑性，亦有其不合逻辑性。正是基于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梳理和分析，一方面可以逐渐明晰陈、庄二人的特点及在明代诗坛的地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陈庄二人并称及在诗史中的回应并非个案特例，有明一代大量存在作家并称的不合逻辑性，前后“七子”即是显例。清人方世举曾云：“诗之有齐名者，幸也，亦不幸也。”^{[42][779]}从研究角度言，对并称作家的合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梳理，无疑对作家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探讨的“陈庄体”，对有明一代作家并称现象的深入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注释：

①庄昶八世孙庄端、庄燮在嘉庆元年所作补修记中有“自康熙壬午四刻后，阅今又已百年”等语，据此庄端、庄燮补修本为五刻。其后，晚清翁长森、蒋国榜辑《金陵丛书》收录庄昶诗文集，是为六刻。

②王夫之对陈献章的评价分析可参看王立新《船山评白沙述论》（《船山学刊》2015年第2期）一文相关论述。

参考文献：

- [1]黄培芳.香石诗话[M].清嘉庆十五年岭海楼黄氏刊本.
- [2]黄瑜.双槐岁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庄昶.定山集[M].清嘉庆六年校刊本.
- [4]罗时进.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3,(2).
- [5]唐伯元.白沙先生文编[M].明万历十一年刻本.
- [6]陈献章.陈献章集[M].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7]陈献章.白沙先生全集[M].明天启元年王安舜刻本.
- [8]胡居仁.胡敬斋先生文集[M].正谊堂全书本.
- [9]章懋.枫山语录[M].金华丛书本.
- [10]章懋.枫山章先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翁方纲.粤东金石略[M].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 [12]杨慎.升庵全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
- [13]李东阳.李东阳集[M].周寅宾,点校.长沙：岳麓书社，

1983.

- [14]黄佐.泰泉集[M].清康熙二十一年黄遂卿刻本.
- [15]周维德.全明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5.
- [16]骆问礼.续羊枣集附二卷[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17]邓伯羔.艺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钱谦益.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9]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1]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2]林俊.见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张翊.东所先生文集[M].明嘉靖三十年张希举刻本.
- [24]方濬颐.二知轩诗续抄[M].清同治刻本.
- [25]湛若水.白沙先生诗教解[M].明嘉靖马崧刻本.
- [26]胡方.鸿椭堂集[M].清同治三年刻本.
- [27]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8]李梦阳.空同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王钺.世德堂集文集[M].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 [30]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32]李承箕.大匪李先生文集[M].明正德五年吴廷举刻本.
- [33]邵雍.邵雍全集·伊川击壤集[M].郭彧,于天宝,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34]孙原湘.天真阁集[M].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 [35]唐顺之.唐顺之集[M].马美信,黄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36]俞宪.盛明百家诗·陈白沙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7]袁中道.珂雪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8]尤侗.艮斋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9]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40]纪昀.纪晓岚诗文集[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 [41]黄佐.翰林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2]方世举.兰丛诗话[M]//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